

阳明后学邹元标思想与学行研究综述

林东杰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邹元标不仅是阳明后学著名代表,而且也是东林党的重要领袖。目前关于邹元标的研究成果,对以下三个方面待探讨较为不足:其一,邹元标在贵州的著述情况;其二,如何看待邹元标晚年首先倡导为张居正恢复应有名誉;其三,黔中王门对邹元标思想的定型产生了何种影响。

关键词: 阳明后学; 邹元标; 东林党; 黔中王门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6133(2016)01-0014-05

DOI: 10.16856/j.cnki.52-1141/c.2016.01.005

A Review on Zou Yuanbiao Studies

LIN Dong-jie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Zou Yuanbiao is not only a famous representative of Yangming School, but also an important leader of the Donglin Clique. The research on Zou Yuanbiao is insufficient in term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works written by Zou Yuanbiao in Guizhou; secondly, the fact that Zou Yuanbiao in his late years first advocated to restore the proper reputation for Zhang Juzheng; thirdly, the influence that the Wang School in Guizhou had on Zou Yuanbiao.

Key words: Yangming School; Zou Yuanbiao; the Donglin Clique; the Wang School in Guizhou

邹元标(1551~1624年),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他不仅是江右王门著名学者,而且与赵南星、顾宪成并称东林党“三君”。万历五年(1577年)邹元标中进士,同年因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因此被廷杖八十、流放贵州都匀卫六年。万历十一年(1583年)邹元标被召回。回朝后,元标因屡屡进谏,触怒神宗,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万历十九年(1591年)两度贬谪南京。第二次贬谪三年考满后,他告病归乡,讲学仁文书院近三十年,培养了大批人才。光宗、熹宗相继登基,邹元标再次入仕,升任左都御史。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元标致仕归乡。天启四年(1624年)卒于家。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矫旨削夺其官职和诰命。崇祯元年(1628年),恢复名誉,追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号“忠介”。

邹元标在世之时,就已誉满士林,《明史》称:“里居讲学,从游者日众,名高天下。中外疏荐遗佚,凡数十百上,莫不以元标为首。”^{[1]6303}袁宏道在

《寿南皋邹先生六十序》中对邹元标更是赞道“今海内名公卿,有举其地而知者,有举其氏而知者。唯吉水邹公,识与不识。皆称之曰‘南皋先生’。非但不名也,且不氏。官掖之深也,厮养之微也,羌胡之遐且桀也,莫不敬惮先生,如所严事之神明。公车之牒,尘累山积,类无不引先生为重。庆、历以来,所称名公卿,未有此者。”^[2]但是到了清代,对邹元标的评价则出现了分歧。《续表忠记》上说“有明理学之传,莫盛于江右;能维持名教、以道事君而身任天下之重者,在江右莫若邹忠介元标。”^[3]与此截然相反,王夫之认为邹元标气节有失,他在《读通鉴论》道“北寺之狱,廷杖之辱,死谏之臣弗避焉,忠也。免于狱,不死于杖,沾沾然自以为荣,而他日复端笏垂绅于堂陛,是亦不可以已乎?如邹尔瞻之复为九卿也,于亏体辱亲之罪奚避焉?人主曰:是尝与囚隶同捱系而不以为耻者也,是恶足改容而礼乎!上弗奖之,下安受之;下既安之,上愈贱之。”^{[4]39}时至今日,对邹元标的评价依

收稿日期:2015-11-16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人文社科项目“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研究”(项目编号:GDYB2010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东杰(1987-),男,福建安溪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儒学、闽台区域史、清水江文书。

然分歧很大。如吴振汉《明儒邹元标的为学与用世》一文则高度评价他在日益败坏的世风中,始终坚持洁身自好,为官时一遇不平就英勇直言,丝毫不畏皇权,堪称明末士林的典范。^{[5]17-48}而罗宗强《道德理想与政局之错位:邹元标》一文批评邹元标虽有高尚的道德操守、敢于直言批评朝政,但却欠缺实际的政治能力和手段,他的努力除了获取极高的社会声誉外,并没有多少实效,表现出了道德理想和政局的错位。^{[6]469-487}

尽管清代以来对邹元标评价各有差异,数量亦不算少,但今人仍对其较为陌生,或至一无所知。然邹元标作为反对张居正“夺情”的主要人物之一,作为江右王门第三代代表人物和东林党著名党魁之一,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必然有助于加深对晚明政治、江右王门(乃至整个王门)以及东林党的认识。遗憾的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看依然比较欠缺,鲜有学术专著或学位论文进行专门研究,相关文集亦未见出版点校本。笔者对邹元标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进行简略介绍,对目前的邹元标研究成果进行文献梳理和综合论述,以期进一步促进对邹元标的研究

一、邹元标的思想、学行与著述

邹元标作为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自然是研究重点之一。早在清初,黄宗羲就评价说:“先生之学,以识心体为入手,以行恕于人伦事物之间、与愚夫愚妇同体为功夫,以不起意、空空为极致。离达道,无所谓大本;离和,无所谓中,故先生于禅学,亦所不讳。求见本体,即是佛氏之本来面目也。其所谓恕,亦非孔门之恕,乃佛氏之事事无碍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则离达道无大本之谓矣。然先生即摧刚为柔,融严毅方正之气,而与世推移,其一规一矩,必合当然之天则,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从佛氏来也。”^{[7]535-536}这是黄宗羲从阳明后学的角度对邹元标的最权威的评价。有意思的是,清代四库馆臣对邹元标思想的认识存有分歧。在《邹南皋语义合编》提要中,如此写道:“其学亦源出姚江,不能一一淳实。然其人则不愧于儒者。”^{[8]815}而在《愿学集》提要中,另有评价云:“其学亦阳明支派,而规矩准绳持之甚严,不堕二王流弊。”^{[8]1514}刘辉平《江右王门学派思想初探》一文,就笔者所见,乃是当代最早探讨邹元标思想的论文,但只是简单勾勒其思想轮廓。^[9]蔡仁厚在《王学流衍——江右王门思想研究》一书中,从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相关邹元标的记载入手,简单介绍了邹元标的思想。^[10]罗宗强的《道德理想与政局之错位:邹元标》一文,指出邹元标的思想是以

儒家为主干兼收佛道,而在儒家思想中,邹元标除了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也受到儒家其他学派的影响(邹元标少年时是比较倾向于程朱一脉),其思想的整体特点是反空谈而重实行。^{[6]469-487}吴振汉在《明儒邹元标的为学与用世》一文中指出,邹元标不认同佛道两家玄虚渺茫的学说,归纳了其思想的特点:始终坚持心统万物的原则,并把此话溯源到孟子;不认可先儒过于执着于书本字句上的考辨,重视身体力行圣人之道和向广大百姓推广自己的心得体验;主张钻研学问和进行政治实践非但不冲突,甚至是密不可分;为学主张“先悟”“重修”“贵证”。^{[5]17-48}张昭炜的《〈论语〉首句“学”诠释中的仁学分化》一文,从邹元标对《论语》首句“学”字的诠释扼要剖析了邹元标的仁学思想。^[11]徐儒宗所著《江右王学通论》,简要介绍了邹元标的学术思想、教学思想、经世思想。^[12]朱生俊等人的《邹元标的理学思想》论述了邹元标对王阳明“良知之说”的继承和发展,指出邹元标特别重视儒家所提倡的“纲常伦理”和“中庸之道”^[13]。

在邹元标的交游方面,禹明先的《袁与土城〈通商碑〉》一文简要叙述了邹元标和播州袁的交往。袁氏是明代播州七大土司之一,袁曾袭任永宁宣抚司唐朝镇长官,万历十八年(1590年)至二十七年(1599年)间修筑土城四围,万历二十八(1600年)袁率家属协助明中央平播,事后袁袭任威远卫首任指挥官,诰封“怀远将军”。^[14]樊树志的《“西学”与王学、东林、复社——李贽、邹元标、冯应京、冯琦、方以智》^[15]和黄文树的《阳明后学与利玛窦的交往及其涵义》一文^[16]则谈及了邹元标和利玛窦、杨廷筠(“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之一)、郭居静(耶稣会士)三人的交往。杨安邦所著《汤显祖交游与戏曲创作》一书的相关章节讲述了邹元标和汤显祖的交往经历和深厚友情。^[17]陈永革《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一书中有邹元标与无念深有、憨山德清、紫柏真可三位高僧交往的简单论述。^[18]

关于邹元标著述的相关研究,汪泰荣对邹元标的著作和编著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并指出了一部分著述的演变情况和当今馆藏情况。^[19]吴振汉《明儒邹元标的为学与用世》一文从不同的角度考证了邹元标的著述情况,指出其《太平山房集》或许在当时只是以抄本流传,而该书的节要本《太平山房疏稿》、《太平山房集选》今已亡佚。其他亡佚之书尚有《太平山房续集》《易毅通》《礼记正义》《学庸商求》《筮仕要诀》。至今尚流传的则为《邹南皋集选》《愿学集》《存真集》《邹忠介公奏疏》《南皋邹先生语义合编》。^{[5]17-48}但是汪泰荣和吴振汉都没有提及邹元标在贵州的著述情况,以及

这些著述是否编入现存的各种文集。

二、邹元标与张居正研究

邹元标入仕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为此遭受廷杖八十的酷刑,并被流放贵州都匀卫长达六年之久,也因此而名高天下、誉满士林。万历十年(1572年)张居正去世,朝野上下开始一致声讨张居正,这些人中不乏当年曾经亲附张居正者。邹元标虽然受到张居正打压,但他并没有对张居正采取任何借机报复的举动,“无只字发其隐”^{[7]534-535}。不但如此,在天启二年(1622年)最早为张居正请谥的人反而是邹元标。邹元标的“忠介”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邹元标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一事,虽然晚明人士纷纷称颂,但清代人有不同看法。如王夫之即批评邹元标明知张居正是小人,却不能审时度势,依然上疏评议张居正“夺情”,白受廷杖侮辱。^[20]晚清著名经学家俞樾甚至称上疏评议张居正“夺情”是为了博取声名,其《邹元标论》中说:“若邹元标之疏,是亦不可以已乎?君子之建言也,非以为名也,冀其君之我听也。若知君之必不我听而犹以为言,则悻悻小丈夫也。当是时,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员外艾穆、主事沈思孝既以此廷杖矣,而邹君者亦既见之矣,吾道之不行,吾言之不用,夫亦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君臣之间以义合者也,彼邹君者,将谓诸贤之去无损吾君臣之义欤,留可也;若谓三纲沦矣、九法斲矣,吾不忍立于其朝矣,去可也。乃视诸贤杖毕,复以疏进必不用之言,以徼必不免之辜。呜呼!可谓豪杰之士,而于君子之庸行或未合也。且其为此疏果何为也哉?争夺情欤?必不可得而争矣。明大义于天下欤?言之者已非一人矣。然则此疏果何为也哉?无乃近乎好名者之所为与?”^[21]

邹元标与张居正之间的恩怨纠葛,研究者自有必要理清其中之复杂关系。但时至今日,学者对邹元标的褒贬评价,依旧有着截然不同的分歧。如吴振汉《明儒邹元标的为学与用世》一文,对邹元标明知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必获廷杖酷刑,依然对义无反顾的行为大加赞扬,称“此非有根植渊深学养之道德勇气,不足成此义行”^{[5]17-48}。与此不同,罗宗强在《道德理想与政局之错位:邹元标》一文中则批评邹元标缺乏对政局的全盘考虑,迂腐地抱守不切实际的道德理想,凭借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上疏反对“夺情”。^{[6]469-487}

要判断邹元标反对张居正“夺情”的是非对错,需要深入分析张居正对“夺情”的态度,并探讨邹元标反对“夺情”的原因。朱东润在其《张居正

大传》中认为张居正对要不要辞官守制犹豫不决,但当时政治的局势离不开张居正,张居正只是被动地接受皇帝和一些官员合力造成的“夺情”事实。^[22]而樊树志认为,“夺情”是张居正和冯保暗中策划的,张居正多次上疏请求回乡守制是掩人耳目的故作姿态。^[23]刘志琴在《张居正评传》一书的相关章节指出反对张居正“夺情”的人中有些是因为反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他们想借反对张居正“夺情”赶走张居正。^[24]那么邹元标是否出于反对张居正改革的原因反对其“夺情”?樊忠涛《张居正夺情始末研究》一文认为邹元标反对张居正“夺情”是出于维护礼纪纲常,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朱生俊。^[13]罗宗强则提出邹元标反对张居正“夺情”,除了出于维护礼制的原因之外,还含有反对张居正改革的成分,惜未进一步深入展开分析。^{[6]469-487}

邹元标晚年首先倡导为张居正恢复应有名誉,但是笔者迄今未见相关研究论文,有的只是一笔带过的描述,如王天有的《东林党和张居正——兼论东林党的发端》。^[25]相关研究工作尚有待深入,如此才能更好地了解邹元标的处事原则,亦可增加他反对张居正“夺情”的观察点。

三、邹元标与黔中王门研究

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随即开始讲学。王阳明的讲学活动培育了一批地方心学人才,从而也导致了全国较早的地域性心学派——黔中王门的形成。^[26]等到邹元标发配贵州都匀卫时,黔中王门已经蔚为大观,出现了以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人为代表的大儒。邹元标到贵州后对孙应鳌、李渭二人推崇备至,并虚心向孙应鳌请教,六年间学业大进。对于邹元标谪戍贵州的生活,《明史》记载:“(都匀)卫在万山中,夷僚与居,元标处之怡然。益究心理学,学以大进。”^{[2]6302}邹元标不但在贵州成就了他自己的道德学行,同时也在当地积极从事书院讲学活动,推动了阳明心学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邹元标与黔中王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这些:黄万机在《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27]和《黔山灵秀钟人杰——历代英才与贵州文化》^[28]两书中,叙述了邹元标讲学都匀,传播阳明心学的情况,介绍了邹元标的几个杰出黔中弟子,并简单提及了邹元标向孙应鳌和李渭请教心学的情况。刘宗碧《贵州的王门后学》一文,也提及了邹元标在都匀向士子们讲授阳明心学、传播阳明思想,并简要叙述邹元标与孙应鳌、李渭的交往经历,如邹元标曾一年数访孙应鳌证学问道,邹元标与学生们讲“圣人必可学而至”就举孙应鳌、李渭二先生为例,邹

元标曾为李渭的《先行录》作序。^[29]肖先治、王路平的《贵阳阳明文化旅游圈的开发建设》对邹元标在贵州的遗迹有简单介绍。^[30]张羽琼侧重论述邹元标谪戍都匀时期兴学黔南的情况,表彰了邹元标在都匀传播心学对地方教育发展的贡献,文中误把邹元标列入泰州学派,其实他应属江右王门。^[31]张明主要从阳明心学传播的角度介绍了邹元标在都匀的讲学情况,点明了邹元标对都匀成为贵州五大王学重镇之一具有决定性贡献,并简单介绍了邹元标黔籍弟子吴铤、陈尚象、余显凤等对乃师所传阳明心学的继承和发扬。^[32]敖以深在《黔东北地域阳明文化研究》一书中,则简要论述了邹元标于都匀讲学传播阳明心学的盛况,介绍了邹元标和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黔中王门著名人物的学术交往。^[33]³⁷⁻¹³⁶庞思纯除了赞扬邹元标兴学黔南的巨大贡献,则侧重叙述了邹元标及其弟子陈尚象(属于黔中王门)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34]

上述文章主要着眼于邹元标寓居贵州期间促进了阳明心学的传播,推动了黔中王门和黔南教育的发展,但却忽略了黔中王门对邹元标的反哺。罗宗强提出邹元标少年时候思想是倾向程朱的,直到贬谪贵州期间,对阳明学说进行深刻领悟后,才转向阳明心学。^[6]⁴⁷⁴⁻⁴⁷⁵敖以深的观点与罗宗强大同小异,他认为,“邹元标的思想源于王学,成就于贵州,受胡直和黔中王门弟子的影响较深。”^[33]¹³⁵而敖以深的另一篇文章《李渭心学思想探析》则简单论及邹元标接触李渭“以行为先”观点,先疑惑后接受的过程^[35],这是笔者见到的唯一一篇探讨黔中王门学者如何影响邹元标思想成型的论文,惜未展开论述。

四、邹元标与东林党研究

晚明的东林党研究长期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邹元标作为东林党“三君”之一,在东林党中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探讨他和东林党的关系。

关于邹元标与东林党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邹元标与东林党的讲学活动。李劲松《邹元标与仁文书院》一文,详细介绍了他归隐家乡三十年的主要讲学地——仁文书院的沿革兴废。^[36]陈时龙《从首善书院之禁毁看晚明政治与讲学的冲突》一文,通过梳理首善书院和东林书院的关系,分析了晚明政治与讲学的冲突,最后指出首善书院被禁毁的原因是缘于当时强烈的“讲学即结党”的政治观念,而非受到东林党连累。^[37]陈时龙在其《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年)》一书中,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且分析了首善书院主盟的邹元标、冯

从吾、高攀龙等人讲学宗旨的不同。^[38]吕妙芬的《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着重介绍了邹元标在江西老家的讲学情况,指出其讲学虽然和阳明学派的活动密切相关,但是能不落阳明学派的藩篱,对走向歧途的阳明末学仍有所批判。^[39]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一书认为东林书院、仁文书院、徽州书院、关中书院构成了一个网络,而东林党正是通过这个网络结合起来的;此外,小野和子通过分析当时的政局情况揭示邹元标等人建立首善书院的目的,乃是为了宣传忠君爱国思想,但这一举动却引来新一轮的政治斗争,邹元标也因此致仕回乡。^[40]罗宗强在《道德理想与政局之错位:邹元标》一文中,批评邹元标建首善书院没有考虑当时复杂的政局以及讲学活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当时尚有边患、民变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处理,讲学不是最为急切的事情。^[6]⁴⁶⁹⁻⁴⁸⁷张永刚介绍了邹元标主讲的仁文书院与东林书院、关中书院、徽南书院的交往,指出四所书院的学术趋同——即共同努力倡导实践以阻止王学空疏流弊的泛滥。^[41]吴震在《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年》一书中以编年的形式讲述了邹元标在万历中后期参与讲学的部分情况,其中有些讲学活动与东林党有关。^[42]探讨邹元标与东林党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还有:王天有通过深入剖析邹元标等东林党人与张居正的关系,指出前者是后者改革事业主要方面的继承者。^[25]葛荃的《晚明东林党人“生命意识”析论——关于士人精神的一种政治文化阐释》一文把邹元标纳入东林党群体进行审视,并指出邹元标继承了儒家的现世传统,而对于生命价值的认识,邹元标更重视的是道德人格的完成。^[43]吴振汉《明儒邹元标的为学与用世》一文认为邹元标虽然与顾宪成、高攀龙声气相通,但是邹元标认同的是东林书院的理想和价值,而不是认同党同伐异的党派斗争,作者列举邹元标没有到过东林书院,以及不盲目支持东林党人让李三才复出的提议,以此作为立论依据。^[5]¹⁷⁻⁴⁸杨映红《唐伯元与东林诸子交游考略》一文,则谈及了唐伯元和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等东林党人的交往。^[44]

五、结语

除了上述提及的研究成果外,杨新民的《关于邹元标及其小楷(赵用贤传并书后)卷》一文分析,邹元标楷书的艺术特点。^[45]王波《儒家民本思想与封建专制政治之契合与冲突》一文,论述邹元标直言进谏得罪万历皇帝,实质反映的是儒家政治思想和封建专制政治之间的矛盾。^[46]徐美洁分析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和晚清经学家俞樾对邹元标不同评价

的原因。^[20] 笔者已知尚有四篇学位论文,分别是台湾大学翁健钟的《邹元标与明代中晚期的讲学活动》(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朱生俊的《邹元标研究》(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魏志远的《邹元标思想初探》(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张昭炜的《良知学的收摄:邹元标思想研究》(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兹不尽述。

以上即为邹元标思想学行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简要概述。尽管笔者努力收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力图全面反映邹元标研究的进展情况,但囿于一己之见,定有所缺失,尚请方家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 [1]张廷玉. 邹元标传[M]//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袁宏道. 寿南皋邹先生六十序[M]//袁宏道集笺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539.
- [3]赵吉士. 续表忠记:第64册[M]//明代传记丛刊. 台北:明文书局,1991:515.
- [4]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9.
- [5]吴振汉. 明儒邹元标的为学与用世[A]//王成勉.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纪念牟复礼教授论文集.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 [6]罗宗强. 明代后期人士心态研究[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 [7]黄宗羲. 明儒学案[M]. 沈芝盈,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刘辉平. 江右王门学派思想初探[J]. 江西社会科学,1988(4).
- [10]蔡仁厚. 王学流行—江右王门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9-142.
- [11]张昭炜. 论语首句“学”诠释中的仁学分化[J]. 南昌大学学报,2009(9).
- [12]徐儒宗. 江右王学通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3-328.
- [13]朱生俊. 邹元标的理学思想[J]. 法制与社会,2009(8).
- [14]禹明先. 袁与土城《通商碑》[J]. 贵州文史丛刊,1996(1).
- [15]樊树志. 晚明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93-195.
- [16]黄文树. 阳明后学与利玛窦的交往及其涵义[J]. 汉学研究,2009(3):143-145.
- [17]杨安邦. 汤显祖交游与戏曲创作[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129-134.
- [18]陈永革. 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3-78.
- [19]汪泰荣. 庐陵古文献考略[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89-191.
- [20]徐美洁. 王夫之“邹元标论”所体现之士气观浅析[J]. 船山学刊,2011(3).
- [21]俞樾. 邹元标论[M]//宾萌集:卷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15.
- [22]朱东润. 张居正大传[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37-272.
- [23]樊树志. 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J]. 复旦学报,1991(1).
- [24]刘志琴. 张居正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6-285.
- [25]王天有. 东林党和张居正—兼论东林党的发端[J]. 学习与思考,1984(2).
- [26]张新民. 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J]. 教育文化论坛,2010(1).
- [27]黄万机. 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6-28.
- [28]黄万机,田原. 黔山灵秀钟人杰—历代英才与贵州文化[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103-110.
- [29]刘宗碧. 贵州的王门后学[J]. 中国哲学史,1997(2).
- [30]肖先治,王路平. 贵州阳明文化旅游圈的开发建设[J]. 贵州文史丛刊,2000(4).
- [31]张羽琼. 贵州古代教育史[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175-176.
- [32]张明. 王阳明与黔中王学[M]//阳明学刊:第一辑. 张新民,主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126-127.
- [33]敖以深. 黔东北地域阳明文化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 [34]庞思纯. 明清六百年入黔官员[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56-61.
- [35]庞以深. 李渭心学思想探析[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0(6).
- [36]李劲松. 邹元标与仁文书院[J]. 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7(1).
- [37]陈时龙. 从首善书院之禁毁看晚明政治与讲学的冲突[J]. 史学月刊,2003(8).
- [38]陈时龙. 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23-250.
- [39]吕妙芬. 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29-134.
- [40]小野和子. 明季党社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57-215.
- [41]张永刚. “天下东林讲学书院”考述[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6).
- [42]吴震. 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360-415.
- [43]葛荃. 晚明东林党人“生命意识”析论—关于士人精神的一种政治文化阐释[J]. 清华大学学报,2004(4).
- [44]杨映红. 唐伯元与东林诸子交游考略[J]. 汕头大学学报,2011(4).
- [45]杨新民. 关于邹元标及其小楷《赵用贤传并书后》卷[J]. 东南文化,2002(7).
- [46]王波. 儒家民本思想与封建专制政治之契合与冲突[J]. 云南社会科学,2004(4).

责任编辑 何志玉